

李玉 教授/李玉 教授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センター 元主任/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原主任

北京大学現代日本研究センター 元中国側主任/北京大学現代日本研究中心 原中方主任

日 時 : 2022 年 3 月 15 日

時 間 : 2022 年 3 月 15 日

場 所 : 北京市内

地 点 : 北京市内

使用言語 : 中国語

使用语言 : 中文

聞き手 : 野口裕子

采访者 : 野口裕子

(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日本国際交流基金会))

【目次】

1. 生い立ちと大学時代
2. 卒業後の歩み
3. 主な研究方向と成果
4. 北京大学現代日本研究コース
- (1) 設立と沿革 : 3 つの発展段階
- (2) 30 年間変わらないこと
- (3) 協力体制
- (4) ハイレベルな講師陣
- (5) 熱心な学生
- (6) 三大学フォーラム
5. 今後への期待と展望

【目録】

1. 人生历程与大学时代
2. 毕业后的经历
3. 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
4. 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
- (1) 创立及沿革 : 三个发展阶段
- (2) 30 年始终如一
- (3) 合作机制
- (4) 高水平师资力量
- (5) 勤奋好学的学员
- (6) 三校研讨会
5. 对今后的期待与展望

【本文】

※インタビュー対象者の使用した言語に基づいて整理しています。(下線部は日本語でのご発言部分)
/根据采访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来整理。(下划线部分为受访者用日语发言的部分。)

1. 生い立ちと大学時代/人生历程与大学时代

我是 1940 年 2 月 15 号生人, 我的原籍是天津市宁河县, 但是我从小是在东北辽宁省抚顺市长大的, 抚顺市是中国有名的煤都。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抚顺念的。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我的父亲我们中国叫职员, 按照现在的话就是公务员, 或者是 サラリーマン,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家庭, 但是我在抚顺上的学校是比较好的一个学校。

我念中学的时候, 我的人文方面课程成绩比较好, 数理化也不是不好, 稍微兴趣不是特别浓厚, 我也喜欢读一些历史的书, 所以我就选到了历史系。1959 年的 7 月份我从抚顺市的第二中学毕业, 同年就参加高考, 1959 年的 9 月, 我就进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当时北大的文科是 5 年制, 理科是 6 年制, 北大历史系当时有三个专业, 有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 我是在世界史专业。我们当时是这样, 一年级到三年级学的是基础课, 主要是学两门通史, 《中国通史》

和《世界通史》，还有《古汉语》等等的基础课。然后到了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就学专业课，所谓专业课就是地区史，国别史。

当时我们世界史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欧美史，一个是亚非史。我当时就选择的是亚非史。亚非史我听的课主要是跟亚非国家有关系的，比如说非洲史，这是区域史。还有国别史，比如说日本史、土耳其史等。当时我选了一门叫《日本近代史》，《日本近代史》讲述的老师是我们国内很有名的学者周一良。周一良教授是我们国家日本史研究领域元老级的教授了，是很有名的。我们那时候讲中国有三大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的周一良，南开大学的吴廷璆，吉林大学的邹有恒，这是三位解放以后我们称为新中国日本历史研究的元老级的人物。

所以我听了他大概一年的课以后，我就对日本史产生了兴趣，我就读了一些日本史方面的书，我当时大学毕业论文写的也是跟日本史有关系的。当时我写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战前日本的法西斯化的进程，北京大学图书馆旧的期刊杂志很多，我除了看中文的参考书，也看了一点俄文的参考书，还有好多资料是大图书馆去看旧期刊，就根据这些资料写论文，因为大学毕业论文要求不是很高。

那个时候中文翻译来的日本人的著作主要是井上清的《日本近代史》，还有俄国学者的著作，大概有一两本日本史著作，其他就比较少了。关于古代史的资料就更少了，另外学习古代史还需要学习日本的文言文，日文叫“候文(そうろうぶん)”，那个比较难。近现代史离我们比较近，特别是近代史是从明治维新开始，中国学者比较注重明治维新，所以从那以后就选择了研究日本近现代史。

2. 卒業後の歩み/毕业后的经历

1964年我9月份大学毕业以后，当时的工作岗位不是自由选择的，都是国家分配，我就留在北京大学任教了。但不久，我就到郊区参加了两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中国叫“四清运动”，毕业以后我们是作为工作队员到北京郊区，先是在机场附近的天竺公社，后来就到昌平区马池口公社，就在这儿搞了2年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6月我回到北大，然后就是文革10年了，所以这一段基本上就没有从事教学和科研。

1976年1月到7月，我回到历史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北京大学举办了一个“日本近现代史培训班”，那个时候是请了日本很有名的教授井上清，他在北大给我们讲课。当时全国比如吉林大学，南开大学，还有北京大学，大概有20多个老师都来听他讲课。我们学了半年的日本史，这个对我本身的日本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后来到了1977、1978年，中国就开始改革开放了，那时候又恢复高考。我的教学主要是讲授一些比如亚洲现代史，日本近现代史，还有日本政治制度史这类的课。我研究的主要的领域是日本政治，日本近现代史和中日关系史。这就是说我的教学也好，研究也好，就已经跟日本有了不解之缘。

那么研究日本是首先学日语，我们东北地区从初中开始学外语，但是学的都是俄语。我在抚顺小学的时候，没有日语的学习环境。大概我的父辈或者是再上一辈人，因为抚顺当时属于伪满洲国这个地域，我听老一辈的人讲，可能念小学的时候都是强迫他们学日语，但是到了我这个时候就不学日语了。可是在抚顺就留下了很多日语的残（留）语。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们抚顺有露天矿，采了煤以后用小的煤车把煤运上来。那个车我们抚顺人都管它叫“轱辘马”，实际上就是日语“くるま”的意思。这种话我们东北叫协和语，这种语言还是有的，但是我现在都忘了。

我的初中、高级中学的是俄语，高考考的也是俄语。我进了北大以后，这5年学的也是俄语。到了1977年以后，我就开始自学日语，请了一个日语系的学生来教我日语。后来1978年的时候，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到现在的外国语学院，那个时候叫东语系，我到该系的日语专业听课，在那专门听了一年的课。

1979年我参加了教育部的全国的日语考试。这考试的目的是选派到日本进修的老师。我参加了考试，合格以后，我就成为叫赴日留学进修的预备人员。1981年的2月份到6月份，我到了现在的大连外国语学院，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实际上是强化班，一天到晚上阅读课、听力课和口语课，授课老师都是日本老师。

那个班结束以后，1981年的9月，我就到了日本的京都大学文学部，一直到1983年9月份，研修了两年。通过这一串的日语学习，基本上我的日语就达到了一般的水平，阅读没有问题，普通的可以做一些交流，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因为我不是日语本科出身的，所以日语水平还是一般，就是“まあまあですね”，但是基本上交流还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是我学日语的经历。

1981年的9月到1983年9月我到京都大学研修，研修期间我的指导教官是松尾尊允（まつお たかよし）。松尾教授是我尊敬的一位老师，他是京都大学文学部现代史教研室的负责老师，他主要是研究大正时期的大正民主运动，即“大正デモクラシー”。他在这个研究领域是比较权威的。他主要讲述的是大正时期的历史，按照日本分期就是“昭和史的前期”，实际上就是战前史，1945年以前的历史。他基本讲述的大概是从1912年到1922年大正时期和1926年一直到1945年的昭和前期。我主要是听他的课，我听两门课，一个是他讲授的，另外一个他有主持的“ゼミ”，我参加他的“ゼミ”。这样对我的帮助也很大。通过我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就给我的日本史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

3. 主な研究方向と成果/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

我1983年9月份回国以后，我的日本史研究大概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我个人的主要研究重点是“大正民主运动和日本法西斯化的过程”，我撰写的主要论文，一个是《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大正民主运动》ⁱ。另外一个就是《试论1924—1932年的日本政党政治》ⁱⁱ，还有一个是《论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护宪运动》ⁱⁱⁱ。关于“日本法西斯化”的成果主要有两篇论文，《30年代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形成及其特点》^{iv}，还有一篇就是《30年代日本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中间阶层》^v。这个是这个专题的代表作。

到了20世纪初，一直到2012年，我主要研究中国的日本研究，就是中国是怎么研究日本的。当时最主要的出了两本论文集，一本是《中国的日本史研究》^{vi}，这个主要是讲了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研究日本史的一些情况，包括中国人是怎么样研究日本古代社会的，怎么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还有一战到二战期间的日本，战后的日本，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还有一本是《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vii}，这个主要是讲述了清代以前，1868到1914，1914到1945以及战后几个时期中国人是怎么研究中日关系史的。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的日本研究回顾与展望》^{viii}。这个主要讲了明代以前，还有明代、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几个时期中国的日本研究的情况。

到了2005年以后，一直到2016年，我主要是研究中日的相互认识。为什么研究这个专题？这个专题主要是2005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日报》，北京大学，还有日本的一个民间团体叫日本言论NPO，这三家联合举行了“东京-北京论坛”。2005年第一届论坛是在北京开的，论坛要求开会之前，中日双方要进

行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比如中国人是怎么看日本的，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和我们院里另外一个老师负责中国方面的民众舆论调查，2005 年是第一届，2006 年，2007 年连续三届我基本上都参与了调查，然后我们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在这三届论坛上，我就舆论调查的情况做了报告。这个论坛一直延续到现在还在办，每年一次，我就参加了前三届。这样引起了我的兴趣以后，我开始研究中日相互认识的问题。我主要有两篇比较重要，一篇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年来中日相互认识的变化——以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为例》^{ix}，还有一篇就是《中日相互认识的演变及其思考》^x，这篇文章是 2016 年发表的。

因为我 2005 年 7 月份就正式退休了，所以从 2005 年以后，基本上就做一些学术研究的组织和服务工作，我本人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研究了。

4. 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コース/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

(1) 設立と沿革：3つの発展段階/创立及沿革：三个发展阶段

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是从 1990 年 9 月份开始的。最早是教育部跟国际交流基金的一个合作项目。当时教育部国际合作司跟国际交流基金会签了协议以后，我们这个研究班是作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一个分支来做。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当时主要是偏重于日本的语言和文化。为什么在北大办？因为到了北大以后可以偏重于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当时主要是经济。刚开始办的时候，北大现代日本研究班是委托经济学院来办的。

大概到了第九期我才接手这个班。我是 1998 年的 9 月份接受的，之后，这个班就从经济学院转到国际关系学院了，当时我担任亚非所所长。亚非研究所与国关学院合并以后，这个现代日本研究班就具体由国际关系学院来运作了。

我接手是 1998 年 9 月份，大概一直到 2012 年的 5 月份我卸任。这个日本研究班从学员的变化来讲大概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90 年到 2000 年大概有 10 期，这 10 期是干部班。干部班就是从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机关团体、研究机构，选拔一些年轻的干部，大概每次选拔 20 个人，到这个班来学习。招生的时候，我们是在报纸上发广告，各地的青年干部把简历投来，我们进行审查，日本叫书类审查，通过审查从中来选拔的。那个时候我的印象好像没有面试，因为报名者都在外地。

最早经济学院管理的时候，最初是一年制，后来就变成半年制，到后来好像就变成三四个月了。学习时间缩短了，我接触的是第九期，那时每年 3 月份招生，学习到 5 月份，然后到日本研修半个月，就毕业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 2001 年到 2005 年，这个班这个时候遇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干部班的招生这个事比较困难。另外加上我们学校也有要求，即作为北大办的日本研究班，北大学生还是应该参与一下。所以这个班从 2001 年开始，只招收 10 名干部，然后招收 15 名北大的研究生，研究生当中有 5 名是博士，10 名是硕士。所以这个班我们一般叫做混合班，就是干部与研究生的混合班。课程的内容、教学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跟干部班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一个干部班，一个研究生班，学员的水平参差不齐，课程对象不一样，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从 2006 年开始全部就改成招研究生了，而且主要是招博士生。从 2006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班就叫博士生研究班了。最早是从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法学院等五个学院中选拔，学制变成一年，每年大概九、十月份招生，面试合格以后就开班，大概基本上从 10 月下旬开始上课，由中日方老师上课。我们这叫秋季学期，到了第二年的 3 月份开始叫春季学期即下学期又开始

上课，上到大概“五一”前后，5月份上旬课堂教学结束，5月的中下旬到日本研修两周，然后毕业。每个学员给6个学分，日本叫单位，就是给6个单位，因为是博士生班，所以当时名字对外就改名叫“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中心”，实际上还是日本研究班，一般我们现在都叫博士生研究班，大概是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

到了2012年5月，我因为已经年纪大了，所以就交接了，就由李寒梅老师担任中方主任教授。

(2) 30年間変わらないこと/30年始终如一

这个班虽然学员的构成变化了，但是有几个是一直坚持下来不变的，第一个，办学的宗旨和办学的目的是没有变化的。干部班，我们主要目的是学员到了北大以后，通过这个班扩大他们的知识面，扩大他们的视野，因为虽然他们有实践经验，但是需要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这样来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回到单位以后，能够促进他们的工作，当时叫为了“四个现代化”，为现代化去努力工作，这是我们干部班的目的。研究生班的目的就很明确了，特别是博士班，就是要扩大他们的知识面，扩大他们的研究视野，提高他们的了解日本、认识日本的能力，提高他们自己的学术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同时更好地了解日本、研究日本，培养研究日本的人才，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实际上就是培养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人才，以上基本上我们举办这个研究班的目的。这两个宗旨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第二个，我们的办学方式和办学内容是没有变化的。办学方式最主要的是理论跟实践相结合，理论就是我们这个班不管是干部班也好，研究生班也好，有一段课堂教学，课堂教学主要是让研究领域要宽，涉及面要宽。另外要多样化，注重中日相互的比较，使这个课程有前瞻性，有前沿性，因为有交叉学科，这样能够使我们这个班的课程有一个合理的安排。当时的课程主要是分三个领域，一个是中日经济，一个是中日的法律和文化，还有一个是中国和亚洲、日本和亚洲。

大概是这样，我简单说一下。第一类课程主要是中日经济，主要是包括日本的经济体制、产业政策、企业管理、金融。第二类课是中日行政和法律，主要包括现代化与政府科学决策、行政机构及其改革、人事制度及其改革、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法制化、经济法、行政法及其运用、社会保障制度。第三类课是中国、日本与亚洲，包括日本现代化的过程、日本的国际化、中国改革与亚洲、中日关系与亚洲、中日文化比较。具体课程很多，比如第四期就有21门课，中方老师讲授11门，日方老师讲授10门，所以这个课程内容还是领域很宽的、很丰富的。

实践课就是访日研修，访日研修基本上是两周左右，组织学员到日本的国会、学校、企业、博物馆、名胜古迹，在这个过程当中与日本的各界人士开展交流。访问地以东京为中心，还有关西、京都、大阪、神户，北九州，有一次还去到新泻，访问的地区还是很广泛的。参观的领域也较宽泛，参观一些日本的博物馆，比如地震博物馆，观看日本的大相扑，享受日本的温泉文化，还有日本的食文化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让学生从各个方面来亲身体验，这样把课堂教学跟实践结合起来，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按照我们中国说的，有一个强大的师资队伍是不变的。我们这个班基本上聘请的都是中国跟日本的一些知名的学者和教授，还有一些是政府的官员和政府机构的研究人员，这些专家和学者应该说都是很有名的，学术水平都很高。比如第四期的时候，中日双方的教师有22个人，其中中方是12个人，日方是10个人，这个队伍一直没有变化。

(3) 協力体制/合作机制

我谈一下现代日本研究班在运营过程当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班中日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很成功的合作沟通机制。这个班最早的管理者，日方一直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总部和北京事务所，中方是教育部国际合作司亚非处。开始这个班是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教育部国际合作司签订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每年有一次协调会，每年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参加协调会的有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总部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北京事务所的负责人。中方是教育部国际合作司的负责人，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领导，北京大学的校领导，还有中方、日方的主任教授和有关人员。每年有一次这个协调会，总结前一年的工作，然后讨论下一期新一年的工作。这个机制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运作是很顺畅的。

到了是 2006 年变成博士班以后，就由北京大学直接跟国际交流基金会签协议了，这样交流就更方便了。从北京大学的体制来讲是由主管文科的副校长负责，具体的由研究生院和国际合作部来操作，然后由国际关系学院的几位老师，包括中方主任教授和一些具体的工作人员来负责，北京大学这个体制是比较顺畅的。国际交流基金会是由总部、事务所还有日方的主任教授，基本上我们也是每年有一个协调会。这个协调会是要总结前一年的工作，讨论下一年的工作，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互相交流及时解决。平时有什么事情我们及时沟通，现在是微信沟通，以前都是通过电子邮件相互沟通。总而言之，我们这个合作协调是很顺畅的，合作的也是很顺利的。

所以说在北京大学中外合作交流方面，我们这个班从 1991 年一直延续大概 30 多年了，这么长时间合作的这样一个研究班，或者说是一个中心也好，在北京大学不能说唯一，但是很少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成功的，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一点。

(4) ハイレベルな講師陣/高水平师资力量

第二个，我们这个师资队伍，中方也好，日方也好，任教的老师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敬业，老师都是认真地备课，讲课也都是深入浅出，理论结合实际，提供很多参考资料，很多参考书，这样就能够把知识很好地讲授给同学，而且课堂有一个互动，老师讲课完了以后，学生提出很多问题，讲课老师都做认真的回答，有一个交流的过程，老师都非常的认真。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两位老师，一个是我们中方的刘德有教授，刘德有是我们中国很有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原来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后来又担任我们中华日本学会的会长，他还是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一直担任我们中方的讲座教授，讲中日文化交流。老先生现在都 90 多了，还是坚持给我们上课，这种精神是非常令人赞叹的，而且他讲课深入浅出，讲得也非常好，老先生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跟学生间的互动也非常的好。当然中方其他老师也不错。

日方老师就是堀江正弘先生，他是日本总务省的一个高官了，大概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副部长级了。他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就担任现代日本研究班的老师，专门讲日本的行政。他也是非常的认真，讲课资料详实，很受同学的欢迎，而且跟我们的关系处的也很好。我到日本访问的时候有时也到总务省去拜访他，课外我们也有很多交流。他跟我们的中方学员、中方老师关系也很密切。总而言之就是日方老师，特别日方老师跟中方学员的关系都非常的融洽。每次讲完课以后，大家一起吃饭、聊天、交流，关系非常融洽。到了日本以后，每次国际交流基金会举行欢迎会的时候，好多老师都参加，大家见面以后都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点我印象也是比较深刻的。

(5) 熱心な学生/勤奋好学的学员

最后第三个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我们的学员。学员我觉得概括起来就是认真、勤于探索、勤于思考。我们的学员无论是干部班的学员，还是研究生的学员，从课堂教学来讲，大家学习都是很认真的，听课都

非常认真记笔记。特别是互动这个环节，学生很踊跃，每次我们的交流时间都延长，老师讲完课以后大概一般都留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总是感觉到不够，话题总是说不完，要交流的，提的问题很多。所以这个就反映了学员很善于思考，求知欲很旺盛。我是一个老师，作为一个老师，学生的求知欲越强，老师当然越高兴了。所以我想从学员的态度来讲，课堂的气氛是非常的活跃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样通过学习、通过课堂教学以后，学员基本上从多角度地了解了有关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知识，特别是通过跟老师的这种相互交流，开阔了眼界，扩展了自己的知识面，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素质。所以课堂教学学员的努力和思考效果是很好的。

另外也有必要提出来的就是访日研修，可以说访日研修对大家帮助是相当大的。通过几个月的课堂学习，到了日本以后，实地地通过参观日本的学校、企业、博物馆，跟日本的各界人士交流。特别是干部班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期最后两天有一个家庭访问，即最后两天在日本家庭里住一晚上，跟日本的民众直接地交流，这个交流是非常直接的，收获是很大的。到了博士生班以后这个家庭访问就没有了，但是每次都有一跟日本学生的交流，比如与东京大学或其他有关大学的学生有举行研讨会，相互交流。所以这样通过实地的参观和日本有关人士和学生相互地交流，这样使学员了解了日本的文化和日本文化的传统、人文环境，以及政府部门的运作、先进的科学技术、城市管理和环境治理等等。所以访问回来以后，学生感受很深，都要撰写访日的小结，谈谈感想和体会。这些体会的共同点就是从感性上和理性上都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和理解，增强了学习他人之长的紧迫感，增进了研究日本、了解日本、推进中日交流的责任感，所以这一点收获是很大的。

在干部班和混合班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求学生回来以后开座谈会，大家谈一些感想。到了博士生班以后，每个学员回来以后都要写一篇访日的感想，另外还要写一篇论文，这个对他们帮助很大。特别是我们增加了一个研讨会的环节，博士生班每期都有一个内部的研讨会。首先确定一个主题，然后选出发言人，发完言以后大家进行讨论，由老师进行总结。因为我们这个班开始是从北大 5 个院系，后来大概增加到 8 个院系，现在好像 11 个还是 12 个院系中选拔出来的。来自各个院系的学员领域不同，所以这种相互交流可以取长补短，所以彼此之间这个交流很重要。

(6)三大学フォーラム/三校研讨会

我们从 2007 年开始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合作，每年举行一次两校博士生的研讨会，到 2009 年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博士生也参加了，这样我们就有一个称之为三校博士生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一直延续到最近，今年好像最近刚举办完。这个研讨会每次轮流在三个学校举行，现在因为疫情都是线上的了，这个研讨会我觉得范围扩大以后，研究生的视野就更广了。因为南开日本研究院的学生主要是研究日本的历史、文化、经济这些方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学生主要研究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而北大的学生学院不同，专业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样三个学校这种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研究是很深入的。同时每届的学生都要提交一篇论文以后，我们将论文编辑成册，出版，书名是《北大未名研究论丛》，每期一册，这个研讨会和《论丛》就给学员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想我刚才讲这三点基本上是我们现代日本研究班成功的原因。所以日本班能够坚持这么三十多年下来，跟我讲的这三点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日本班通过这三十多年来的运作，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我想作为一个中日文化交流的机构，应该说我们还是有所贡献的。今年正好是日中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我们还是应该共同努力，继续把这个班办好。

5. 今後への期待と展望/对今后的期待与展望

我研究中日认识，主要是从古代一直到2000（2010）年，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左右。我主要是研究日本古代、近代、现代，中日之间相互认识。总的趋势是这样，从古代讲，因为中国文化发展比日本稍微历史悠久一些，基本上日本的对华观，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羡慕的慕，就是慕华，对中国还是很尊敬，特别隋唐是学习中国的。到了近代以后，由于中国落后了，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华观发生变化，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对华的蔑视。到了90年代以后，当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以后，尤其是2010年以后，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国力有了变化，日本人就产生了一种焦虑感，所以对华就出现了一些“中国威胁论”等等，中国人对日本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还是应该向日本学习”的态度，但是同时还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古代的时候日本对中国是仰视，近代以后是日本对中国是俯视，到了现代基本上是一种平视，相互是这样一个关系。

中国的研究方法跟日本的研究方法稍微有些区别，日本人比较注重微观，中国人比较注重宏观。所以我觉得中方应该加强对日本的人文基础研究，包括对日本的历史、传统文化、日本的国学，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但现在研究现状的比较多，现在正在改变，比如研究日本的古代史、日本的文化，这方面渐渐多起来了。所以我想这点应该是慢慢地改变。1990年的3月到1991年3月，我在明治学院大学做了一年的客座教授，我主要在那用日语讲授中日关系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2000年的3月到2001年3月，我又在日本的信州大学做了一年的教授，主要讲授中日关系史。实际上我在日本大概长期的驻在加在一起是四年，京都大学待了两年，明治大学待了一年，信州大学待了一年，差不多十年去一次日本。所以通过我自己的研究和实践，深深地感觉，民间交流特别是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我觉得我们的现代日本研究班是很好的一个形式，所以今后中日交流不管政治关系怎么样，这种民间交流，特别是我们学者之间的交流，是不能够中断，应该继续的，大家应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学术问题进行研讨。我觉得这点对于促进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还是有很好作用的。

-
- i 李玉《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大正民主运动》，《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1期
 - ii 李玉《试论1924—1932年的日本政党政治》《世界历史》，1990年第3期
 - iii 李玉《论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护宪运动》《亚非研究》，第6辑，1996年
 - iv 李玉《30年代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形成及其特点》《世界历史》，1984年第6期
 - v 李玉《30年代日本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中间阶层》《世界历史》，1987年第3期
 - vi 李玉《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 vii 李玉《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 viii 李玉《中国的日本研究：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 ix 李玉《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相互认识的变化——以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为例》，《亚太研究论丛》，第九辑，2013年
 - x 李玉《中日相互认识的演变及其思考》《亚太研究论丛》第十二辑，2016年